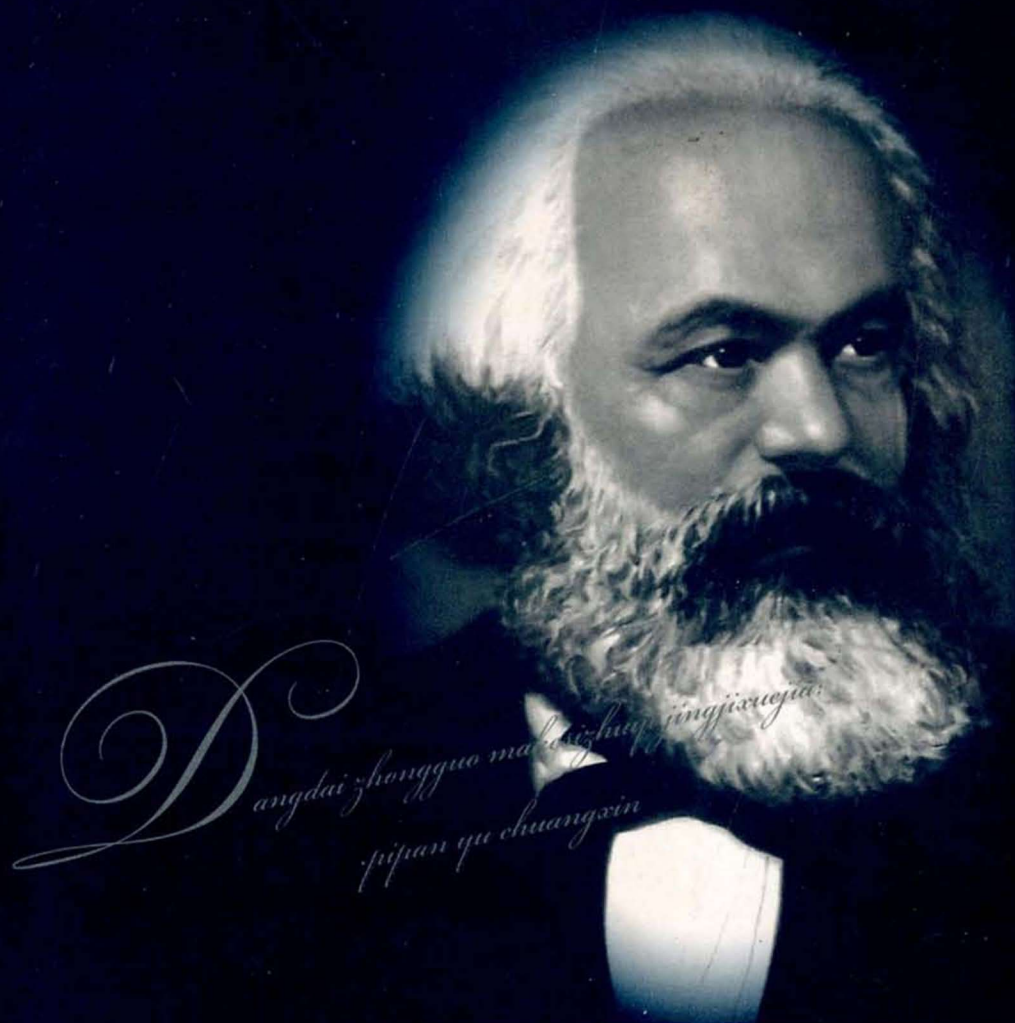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批判与创新

刘思华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 / 刘思华
编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 5
ISBN 978-7-5100-4619-3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F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205 号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

策划编辑 刘婕妤

责任编辑 段纪明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25

字 数 720 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2版 2013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100-4619-3/F · 0068

定 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

编 委 会

主 编 刘思华 项启源 杨承训

执行主编 谷亚光 薛宇峰 李欣广

序 言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为了纪念党的九十华诞,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组织编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创新与批判》一书,并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献礼。这对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境界,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已故的许涤新、骆耕漠、王亚南、孙冶方、薛暮桥、陈岱孙、宋涛、陶大镛等,他们为宣传、阐述、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些经济学大师的指导和带动下,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陆续成长。当代中国已经走上复兴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理论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队伍里,老、中、青学者各自发挥其学术专长,开展传承、创新与批判。他们在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中,捍卫了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他们的理论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们党和国家有关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理论与政策真正作出贡献的,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是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从本书所陈述的各位学者的业绩与思想风格当中,可以了解到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批判历程。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园地里,已经形成了批判与创新均较为突出的各个年龄段的杰出经济学家。本书收集80多岁的有刘国光、胡代光、卫兴华、张薰华、项启源等;70多岁的有吴易风、吴宣恭、洪远朋、杨承训、刘思华等;60多岁的有程恩富、林岗、王振中、李炳炎、何干强、李建平等;50多岁的有左大培、白暴力、马燕、杨志、张忠任等;40多岁的有胡乐明、余斌、张宇、孟捷、丁堡骏等。他们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学术风格。而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多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引起国际国内经济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将有助于繁荣中国和世界的科学经济思想,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在世界经济、社会与生态各个领

域,由资本主义制度、政策和观念所造成和加剧的矛盾,唤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将产生重大的感召力。

中国经济学家很多,入选本书经济学家的学术标准是:①2000年以来仍然活跃在经济学研究领域;②在其论著和学术活动中公开地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③在其论著中积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同时,自愿提供本人基本学术资料,确保本书的介绍准确无误。我们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列入的只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未能收入。我们期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不断壮大,理论研究日益兴旺。如有可能,我们将来再版时可以继续增加未列入的学者。

本书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按如下方式进行人名排序:前面九位是按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论集(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原有顺序排列。这部专著介绍了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与重大理论贡献,按照先科研单位、后高等院校的顺序。九位以后的则按姓氏笔画来排序。

本书是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在2010年的学术成果。本研究中心是全国首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命名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的科研工作得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大力支持。编撰这本著作由本研究中心课题组承担,得到一些同行的支持和指导。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创新与批判》课题组

2011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集	刘国光·····	1
第二集	于祖尧 ·····	8
第三集	程恩富·····	16
第四集	胡代光·····	22
第五集	卫兴华·····	29
第六集	吴易风·····	36
第七集	张薰华·····	46
第八集	洪远朋·····	51
第九集	刘思华·····	61
第十集	丁 冰·····	71
第十一集	丁堡骏·····	77
第十二集	马 艳·····	83
第十三集	文 魁·····	88
第十四集	方兴起·····	92
第十五集	王志伟 ·····	100
第十六集	王振中 ·····	104
第十七集	左大培 ·····	109
第十八集	冯金华 ·····	118
第十九集	白暴力 ·····	124
第二十集	有 林 ·····	135
第二十一集	许兴亚 ·····	143
第二十二集	许有伦 ·····	150
第二十三集	许崇正 ·····	156
第二十四集	刘永佶 ·····	160

第二十五集	刘海藩·····	166
第二十六集	任治君·····	171
第二十七集	朱炳元·····	178
第二十八集	陈 平·····	185
第二十九集	陈 征·····	191
第三十集	陈宝森·····	196
第三十一集	吴 栋·····	201
第三十二集	吴宣恭·····	208
第三十三集	余 斌·····	216
第三十四集	宋小川·····	222
第三十五集	何干强·····	228
第三十六集	何秉孟·····	234
第三十七集	杨 志·····	245
第三十八集	杨 斌·····	251
第三十九集	杨玉生·····	258
第四十集	杨承训·····	264
第四十一集	杨继瑞·····	270
第四十二集	杨惠昶·····	277
第四十三集	沈立人·····	283
第四十四集	李 琮·····	287
第四十五集	李 翀·····	293
第四十六集	李成瑞·····	298
第四十七集	李成勋·····	304
第四十八集	李欣广·····	309
第四十九集	李建平·····	315
第五十集	李济广·····	324
第五十一集	李炳炎·····	330
第五十二集	张忠任·····	338
第五十三集	张 衍·····	345
第五十四集	林 岗·····	350
第五十五集	孟 捷·····	353
第五十六集	郑 彪·····	359

第五十七集	郑志国	365
第五十八集	郑宗寒	371
第五十九集	周小亮	376
第六十集	周明生	382
第六十一集	周新城	389
第六十二集	胡 钧	394
第六十三集	胡乐明	398
第六十四集	胡世祯	406
第六十五集	赵 磊	414
第六十六集	赵华荃	419
第六十七集	荣兆梓	424
第六十八集	项启源	430
第六十九集	逢锦聚	435
第七十集	郭 飞	440
第七十一集	夏小林	446
第七十二集	贾根良	452
第七十三集	顾钰民	457
第七十四集	袁恩桢	466
第七十五集	程启智	470
第七十六集	靳共元	474
第七十七集	简新华	479
第七十八集	裴小革	485
第七十九集	谭崇台	491
第八十集	颜鹏飞	496

第一集 刘国光

一、刘国光的名片

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至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1993—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2006年7月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5年3月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0年5月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奖。

二、刘国光的选择

查阅次数最多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受到影响最大的一本理论书籍：资本论。

最佩服的一位古代中国伟人：孔子。

最佩服的一位现代中国政治伟人：毛泽东。

最佩服的一位外国学者：马克思。

推选三位世界千年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孔子、爱因斯坦。

最重要的人生格言：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

学术目标：为劳动人民服务。

最赞赏的学风：把前人的东西钻研好，在掌握正确方向的基础上调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的思想。

对自己学生的最大希望：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三、刘国光的论著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

《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改革、稳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中国经济走向——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

《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刘国光文集》（十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经济学新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刘国光等著），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

《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考察资料》（刘国光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刘国光等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1998年9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出版。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现实——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刘国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刘国光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

《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香港经济导报社，1985年。

《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

四、刘国光的批判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刘国光的深切忧虑和思考，由于事关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作为一位改革开放的坚定推动者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坚决抵御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旗帜性人物。

2005年7月，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刘国光的谈话整理成文章后，在《高校理论比较》第9期和《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

“刘国光讲话”尽管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题，指出了当前经济学教学

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问题,但其实质和重大意义是,提出了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主张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直接触及和坚决揭露新自由主义在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干扰中国发展方向这个根本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刘国光讲话内容公开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时称刮起“刘旋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学者、干部和群众都支持刘国光的讲话,当然,也有人攻击刘国光的观点。

在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向,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反对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2005年,刘国光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他因年事已高没再参加,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他在中国社科院也提了反对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

刘国光在2007年《红旗文稿》第24期发表了《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认为在有关改革收入分配的众多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制与所有制的关系。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加大力度,但是,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

的原因时，人们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也必须应对。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这“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反对否定其计划性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就要包含计划调控，它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不能因为字面上没有“有计划”，就不要计划，不发挥计划的作用了。用市场化来概括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下面的一个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们要尊重市场，但不可迷信市场。我们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同样是人类发明的调节手段，弃而不用。据在我们的经济学界、理论界甚至于财经界，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得一谈。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态势下，强调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计划调节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歪曲的“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离开不了国家宏观调控、计划调节的加强和完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主要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计划，但它同时必须有指导和约束作用，就是说有导向的作用。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反对“私有化”。刘国光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划清四个重要界限里面的一条。不过要弄明白，“私有化”和“单一化”这两个错误倾向，哪一个目前是主要的。当前主要的错误倾向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私有化”。对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两种倾向各打五十大板，不中要害，实际上是把私有化错误轻轻放过。如果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降得很低，以趋于零，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

五、刘国光的创新

刘国光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诸多领域，作出了创新性的重大贡献。

（一）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和创新

刘国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始终抓住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

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属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一直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的探索和论述。早在1979年，刘国光在与赵人伟合作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就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互相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较早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前瞻性贡献。

他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支持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分类和目标选择，刘国光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纳为六类。他在这种精细分析的基础上，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市场取向和坚持从国情出发这三个选择原则出发，由开始时主张“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顺理成章地发展到更为明确地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创造，其特点是：①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②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行多种分配方式；③在运行机制上，宏观管理以计划为导向，力度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

1992年，刘国光在十四大前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曾较早提出消减、取消指令性计划，强化市场取向曾受到批判，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二）关于体制转换的途径

刘国光认为应推行渐进积极改革，要遵循渐进原则和配套原则。其依据主要在于：①模式转换的实质是从以半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走向基本规范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较健全的市场机制；②改革是一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必然引起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并有赖于观念更新，这都不能急于求成；③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明显，一步走难免一刀切，必然脱离部分地区的实际；④改革缺乏现成样板，在理论、经验和规划上都需要探索和积累，否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同时，在渐进求实的行进中，应当也可能作出总体设计，使各项改革整体配套，同步前进。

为了实现改革的稳健发展，不仅要注意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依存，而且注重为改革提供支持会良好的经济环境，他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有限买方市场”概念。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

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他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接着他在1988年初在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后来发表《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的口号不能放弃,分析通胀机理,力陈治理对策,引起广泛反响。他的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三)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长期研究和贡献

改革开放以前,他曾致力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在长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刘国光也进行了长期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刘国光还很有见地地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传统体制不利于综合平衡,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凸现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必要认真总结自己并吸取别国的历史经验,从本国实际出发,实现战略的及时转换,扬长补短,稳定增长,积几十年之功,就能改变面貌。刘国光归纳出判定经济发展质量的若干基本原则:①经济发展的质量目标,不是要求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要求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②这个战略目标,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③这个战略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结构的关系。④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要从外延为主逐步转向内涵为主,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⑤在重视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同时,要越来越重视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⑥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刘国光及其领导的研究班子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不断针对宏观形势好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颇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有积极的影响。

(四)“双重模式转换”的提出

刘国光首先提出,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我国经济就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双重模式转换”。在1985年《略论两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刘国光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保证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从双重模式转换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他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做出了先行的论证。其中“体制转换”后来发展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战略转换”包含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实际上后来被中共十四大五中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断。他当时就提出,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过程。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也与“双重模式转换”和“两个根本转变”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延续性。

(五)提出和发展了稳健的宏观调控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和政策,刘国光认为,宏观经济的管理或调控,本身就含有战略要求。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体现在战略目标上,总要与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目标,可以分为总目标(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分目标(包括经济适度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就业比较充分、生活逐步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还有“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和“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等。与宏观目标相联系的是宏观政策和相应的宏观措施,包括运用经济手段、法律、行政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等。最主要的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的实质,是根据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运用经济杠杆,形成经济参数,引导这些经济主体使其行为符合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要求。

刘国光有一个著名的并始终坚持的理论观点,即在中国更要着重防止国民经济“过热”、保持稳中求进,并主张在发现过热趋向时实行“软着陆”以防止实行“硬着陆”,陷入周期性大起大落的“怪圈”。他主张实行松紧适度、总体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他十分赞成中央把坚持“适度从紧,灵活微调”作为一项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远景目标纲要。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1997年《论软着陆》一文中,刘国光深入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既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也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而抓紧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第二集 于祖尧

一、于祖尧的名片

于祖尧 1933 年 1 月出生于安徽天长市一个共产党人世家。祖父于则周先生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是中共天长地区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亲属中有 6 人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1944 年，时年 11 岁的于祖尧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红小鬼”。由于年幼，他被保送进淮南公学学习。1946 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华中根据地发动进攻，于祖尧背上被包跟着部队抢渡了淮河，开始了长达 3 年的转战岁月。在战争环境中经历了血与火洗礼，于祖尧坚定地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与理想。

1951 年，于祖尧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师从宋涛、苏星等著名学者。于祖尧学习刻苦，成为成绩优异的优等生，两次被吴玉章校长授予“模范学生”称号，最后以全优成绩毕业。1955 年被选入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在十年“文革”时期，他把读书当成“避风港”，重新学习、精读和系统阅读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深入研究苏联国民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并用比较方法，重读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代表作，将把他们的观点、方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加以比较和分析；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建设中的问题。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1978 年于祖尧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1979 年发表了《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质》，提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就是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孙冶方先生的赞赏。先后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 300 多篇论文，出版《于祖尧文集》等论著多部。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于祖尧教授还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先后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党委书记、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于祖尧教授被评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会。

二、于祖尧的论著

《于祖尧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 年第 3 期。

- 《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属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0日。
- 《机电工业产品进入市场之后》，《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
-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经济研究》1983年第6期。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经济研究》1984年第11期。
- 《论商品经济一般的基本规定》，《经济问题》1984年第12期。
- 《关于商品关系和社会主义》，《光明日报》1987年1月17日。
- 《价值规律和体制转型时期的总量平衡》，《财贸经济》1990年第3期。
- 《论市场约束》，《财贸经济》1991年第4期。
- 《坚持市场取向，硬化市场约束》，《经济研究》1991年第3期。
- 《论经济缝隙、缝隙经济和经济体制》，《经济研究》1992年第12期。
- 《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现代化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谈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
- 《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求是》1993年第14期。
- 《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道路》，《财贸经济》1993年第11期。
- 《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 《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7年第2期。
- 《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 《中国经济内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 《政治经济学研究50年》，载《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休克”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访问俄罗斯见闻》，《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3月30日。
-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 《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2期。

三、于祖尧的批判

在探索中国改革取向与体制转轨目标的艰辛历程中，于祖尧教授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单纯是超阶级的学说，已成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实行经济扩张、策动和平演变的政策工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观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和分析必须有历史的观点。从全球经济思潮的实质作用看，“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于祖尧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自己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守信念，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市场经济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格局的加快，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渐次泛滥，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取向、理论基础的纷争日益激烈。于祖尧发表的《理论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命运》、《经济学遭遇“瘟神”》等系列文章，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原理指导